

非洲民间故事

[美] 保罗·拉丁◎编

李蓓蕾◎译



African
Folktales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德国作家**卡夫卡**推荐的
非洲版“伊索寓言”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民间故事 / (美) 保罗·拉丁编 ; 李蓓蕾译.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4

书名原文: African Folktales & Sculpture

ISBN 978-7-308-19056-5

I. ①非… II. ①保… ②李… III. ①民间故事—作品集—非洲 IV. ①I4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3126号

非洲民间故事

[美] 保罗·拉丁 编 李蓓蕾 译

责任编辑 马一萍 仲亚萍

责任校对 赵 伟

封面设计 林智广告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06千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056-5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译者序

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是丰富的想象和鲜活的现实的生动结合。非洲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非洲黑人民间故事是非洲黑人世代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学遗产,是世界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黑人民间故事是南非前总统尼尔森·曼德拉、德文作家卡夫卡等许多世界名人推荐的阅读宝库,为非洲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精神源泉,塑造着非洲黑民族的文化形象。

著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保罗·拉丁(1883—1959)编写的《非洲民间故事与雕刻》(*African Folktales & Sculpture*,1952)是介绍非洲黑人民间故事的经典之一。该书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豪萨、班图、阿散蒂、布须曼、祖鲁等民族)的80个口述经典。这些故事既有神话故事,亦有流传在非洲民间的幽默轶事,可大致分为四个类别——世界及其起源、动物及其世界、人的世界、人及其命运。《非洲民间故事与雕刻》自1952年出版以来流传甚广,被翻译成德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界的高度评价。书中的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到非洲的风土人情,为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而且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思想。

此次,译者将这80个故事译成中文,并取名为《非洲民间故事》。

本书中的80个民间故事与非洲黑人的文化心理、哲学思想、语言表达、艺术创造、生活趣味息息相关。它们对社会与历史、政治与经济、伦理与道德、文化与艺术有着丰富多元的表征和思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彰显着人类的许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这些非洲黑人民间故事不仅描绘了南非羚羊、朱羚、非洲蹄兔、热带丛林蜘蛛、猴面包树等非洲特有的风物，而且塑造了许多经典的文化英雄，例如机智的野兔、狡猾的蜘蛛、单纯善良的羚羊、擅言的学舌鸟、捍卫正义的老鹰，以及战胜水怪的酋长、复仇的妻子、无私的父亲、坚韧的母亲等。塑造文化英雄是非洲黑人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喝错粥的妻子》为例，凶恶的丈夫要求他的第一个妻子只喝小米粥，而他自己却喝高粱粥。妻子偶然一次喝了高粱粥，便被丈夫用斧头砍死了。妻子化作幽灵回到家中找丈夫复仇。她作为文化英雄的创造力在文本内表现为，她从温顺善良的妻子转变为死后愤怒复仇的幽灵。她在文本外的创造力则在于她的转变和歌唱尖锐地反映了一些黑人女性遭受的家庭暴力和性别压迫。她的歌词将小鸟、幽灵和高粱粥并置，暗喻黑人女性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女性好似“笼中之鸟”的卑微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处境。这样血泪的控诉令人心痛，更发人深省——

搅搅粥，搅搅粥，小鸟。
搅搅粥，搅搅粥，小鸟。
啊，母亲啊！满足于小米。
一点高粱粥就是一个幽灵。

非洲黑人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擅长言说，巧妙地运用重复、反讽、双关、暗喻、拟人、对比等语言技巧，把言说转换成一种充满仪式感、类似于表演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活动。例如，《聪明人和傻瓜》中傻瓜的歌唱有谴责、追忆、倾诉、表达、推理、抒情等成分，是言说仪式，更是主体表达。傻瓜的父亲和兄弟贪心地吃着他抓来的鱼，却不给他剩下半点。父亲第三次吃着傻瓜抓来的鱼时，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喉咙，傻瓜于是唱道：

你吃着，吃饱喝足；
一根鱼骨卡在你的喉咙；
现在你的生命临近完结，
鱼骨仍旧卡在你的喉咙。

聪明的兄弟，你猎杀了鱼，
何曾给傻瓜吃点？
没有！现在他快死了，或许你宁愿
你已给傻瓜吃过了。

傻瓜其实不傻，他再三地宽容他聪明的兄弟愚弄他，只是为了等待他那残忍的兄弟和父亲有悔悟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迟迟不来，他便选择不再宽容。

在非洲黑人民间故事中，歌唱似乎比直接的语言叙述更能讲述故事、打动人心和引起共鸣。它能够打破故事讲述的单调节奏和沉寂氛围。随着歌唱者的经历越来越多，他的歌词也会越来越多，歌曲则越来越长。歌唱者把最新的经历放在最前面歌唱，再回述之前的事情。歌唱作为一种言说形式将人物眼前面对的现实与他的回忆重叠，形成一种二重奏。例如，《恩贡巴的篮子》的女主人公恩贡巴孤独地在河边钓鱼，一边追忆她母亲照料她不够细心，一边想象着她的姐妹们愉快地钓到鱼的情景：

如果我的母亲，
（她钓到一条鱼，把它放进篮子里）
曾仔细照料我，
（她又钓到一条鱼，把它放进篮子里）
我本应与她们同行，
（她又钓到一条鱼，把它放进篮子里）
而非独自一人在此。
（她又钓到一条鱼，把它放进篮子里）

这段歌唱形象地刻画出恩贡巴百感交集的心境。她一面因为自己生了病，不能与她的姐妹们一起去河边钓鱼而伤心，一面又因为自己此刻独自一人，顿感孤独、害怕和忧虑。

二

非洲黑人民间故事体现“小故事、大图景”的叙事格局，它的言说并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独白，而是层次丰富的对话，对话的核心之

一便是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性。它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四个方面探讨人的存在，凸显人类的存在是主体间的存在。个体的存在是建立在他与其他主体和事物之间的基础上的。在非洲黑人民间故事中，人与事物之间不是单纯的表征者与被表征的对象，他们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是情感相通的，例如，人把雨视为痛苦、悔恨、羞愧和悲伤时流的眼泪。人与动物所代表的自然虽然总是在抗衡，但彼此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在一些故事中，灌木猪等动物会幻化成人，而人也能够幻化成动物。这种对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的关注影响着非洲黑人对生命和道德的认知。因此，我们总能在故事中看见罪恶—复仇/惩罚、善良—回报/奖赏等因果关系。

在《为什么一个人不要揭露另一个人的来源?》《高大的少女乌恩图姆宾德》等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不揭他人隐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信守承诺”“忠诚勇敢”等美德相似的道德训诫；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可与中国文化有共鸣的核心价值观，例如《反驳是如何在阿散蒂出现的?》提倡言论自由。蜘蛛夸库—安耐西批评那个名叫“讨厌被反驳”的人——“你说你讨厌被反驳，但你自己又反驳别人”。言论霸权跟其他形式的霸权一样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使用的依然是双重标准。当然，非洲黑人民间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为人处事的道理上同样不乏共鸣。例如，《为什么你的亲属请求与你同行时，你应当让他陪伴你?》表现了祸福相依的道理，故事的讲述者想要告诉听故事的人，一开始境遇最差的人不一定最后的结果最差，命运充满了反转的可能性。故事《姆里莱的历险记》则提醒人们要知恩图报，懂得感恩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非洲黑人民间故事在讨论罪恶（贪心、欺骗、背叛、伤害等）与惩罚、报复与原谅、压迫与抗争、霸权与反抗之间的关系时，总不忘

展现万物之间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残酷的故事中不失对善良、温暖和美好的刻画，幽默的故事中不失对相关问题的追问和考量。例如，《水中巨人》在主张惩处恶人、伸张正义的同时，呼吁要宽容，得饶人处且饶人。

三

非洲黑人民间故事在教育、建构社会认同和传承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它仿佛斑斓的多棱镜，我们可以透过它深入了解非洲的民间文学、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了解非洲黑人的语言艺术、生命经验和哲学思想。

关于本书的翻译，译者一方面适当修改或删除了一些关于暴力的过于直白和自然主义的描写，例如故事中一些过于残酷的惩罚手段。非洲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主要依靠道德规约来治理和调节集体、社会秩序，往往以强调罪恶的严重后果来警示人们。因此，读者应当注意文化语境的不同，多从象征意义而不是单一地从字面意义去理解非洲黑人民间故事的内容和语言。另一方面，译者为每个故事涉及的具有文化特色的词语和概念作了注释，以便于读者理解。译者还尽量保留了一些非洲语言词汇的发音，如故事《为什么孩子先被鞭笞》中的那条神奇的鞭子“阿比瑞迪亚布拉达”等，力求保留原著为读者营造的关于非洲语言的想象空间。此外，蜘蛛安耐西是非洲民间故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物形象，鉴于他在各黑人民族文化中的形象和意义有所不同，译者在涉及这一形象的故事中均作了必要的补充说明。

“在非洲，民间故事是一种负担；但它是叙述者们优雅地承担起

来的负担，而且广泛地拥抱了大多数的听众。正如阿肯人所言，‘当两个人一起挑担子，它便不再是负担了’。”^A这里的“两个人”可以是两个不同的叙述者，也可以是叙述者与聆听者。对于非洲黑人而言，民间故事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它承载着他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

中非友好交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如今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增进与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文明互鉴促进了世界多样文化的共生共荣。在此时代语境下，对非洲黑人民间故事的引介、认知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非洲文化和世界文明，相信这本《非洲民间故事》在为我国读者提供更多富于意义和趣味性的非洲黑人民间故事的同时，能为促进中非之间的文化理解和民心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李蓓蕾

2019年1月25日于金华

A Yankah, Kwesi. *The Folktale and Its Extension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2.

序言

—

西方人对非洲本地部族居民的误解多于对其他民族的误解。或许，原因不难解释。非洲文化被那些外行，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外行，一代又一代地习惯性地视为意指着“原始”这一被长期滥用的词语中的每个含义。它们被认为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那些外行和不少科学家受到赫伯特·斯宾塞在19世纪后30年阐述的进化理论的影响而提出的。斯宾塞的进化理论适用于那些处于人类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或群体。然而，这里涉及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些文化属于一个从15世纪至19世纪一直被奴役的种族。尽管这个种族的某些成员在一些地区得到解放，但他们在社会中还是被迫处于低等地位。他们被迫与白人隔离，干着最卑微的工作。简而言之，他们被迫过着一种在经济上、精神和思想上均贫困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中，早期非洲民间故事的出现自然遭到种种怀疑，因为它们提供了最清晰的证据，证明了它们的创造者们并不原始。同时，它们是对那些收集这些故事的传教士的颂扬，传教士们思想开明，至少达到了将这些非洲本地的民间故事与他们自己的民间故事及童话平等看待的程度。有一个人尤其值得一提，他就是卡勒韦主教（Bishop Callaway），他有两部著名的作品，即《童话，传统和祖鲁人》（*Nursery Tales, Traditions and Histories of the Zulus*, 1868）和《阿马祖

鲁人的宗教体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the Amazulu*, 1870)。

其他许多思想开明的人士很难相信非洲黑人拥有一种具有艺术特色的口述文学，很难相信这种口述文学在很多方面可以与他们自己的民间故事媲美。著名的德国非洲研究者卡尔·迈因霍夫 (Carl Meinhof) 指出，1888年有一本喀麦隆的民间故事集在德国出版，许多与当地有所接触的白人表达了十分愤怒的抗议，他们坚持认为没有黑人能够创作出那些故事。

当然，到了今天，任何一个没有完全被偏见束缚，或没有把自己置于过于绝望的学术境地的严肃的人，都不能对非洲本地部族的高品质的口述文学视而不见。然而，在许多地方，有的人仍然认为，非洲本地部族神话的独特，以及它与波利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印第安人的神话的不同，不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环境，而是源于黑人头脑固有的“缺陷”。其含义是黑人的头脑比其他民族的头脑原始。德国人类学家赫曼·鲍曼 (Hermann Baumann) 和其他许多人类学家都赞同，他们坚持黑人没有创造真正的神话的天赋这一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民间文学中缺乏真正的有关宇宙哲学的的神话。

只有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但是，由于缺乏非洲黑人文明的书面记载，我们从未获得这些知识。但情况并非是完全令人绝望的。我们现在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料，可以对相当数量的民间故事进行研究，对大量的文化因果和关联做必要的了解。我感到，有足够的信息能够用来证明我们某些冒险的观点和设想，以及那些观点和设想对神话和文学的发展之重要意义。

简单说来，有以下观点：所有的民族都被赋予了同等的创作神话的想象力。今天发现的神话种类并不一定也不可能是某一个民族曾拥有的唯一一种神话。神话和民间故事随着文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

变化，这些故事从它们与文明社会经济结构的联系中发展出的观点和思想也发生着改变。它们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变化可归因于两个方面：不仅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思想意识，而且这些特殊的思想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那些被赋予艺术天赋的个体）重组、重新闻释和赋予旧的文化传统及背景新形式的过程。我们今天掌握的所有证据——并不算少——证明了我们的设想，即有人类以来，具有艺术天赋的个体存在于所有的民族。

关于亚洲和欧洲的伟大的历史文明，一些理论家^A认为，创造神话的想象力在三个历史时期和三个地区受到了最为深刻的激发并找到了它最为丰富的表达，即古印度、古希腊和信奉基督教的中古时期欧洲。寻找精确的数据总是危险的，我不认为把古印度时期指定为公元前2000年初，把古希腊时期指定为公元前1000年初就十分正确。而且，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观点，正如大学者本菲（Benfey）曾提到的，对于古希腊和信奉基督教的中古时期的欧洲的作品中发现的情节、主题和母题是否来自古印度，这并没有多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对它们的专注的强度。

卓越的民俗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把所谓的创作神话的想象力的激发局限在某些民族的几个历史时期，这一点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或许，可以用学术头脑和视野的狭窄这两个为人熟知的原因来解释。不用说：事情远非如此。

从19世纪和20世纪所获得的关于本土民族口述文学的资料来看，现在比较明确的是，在他们的某些历史时期，创作神话的想象力被激活，作品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例如古希腊、古印度和信奉基督教的

^A 民间故事芬兰学派的成员尤其持这一观点。

中古时期的欧洲。然而，如果认为创作神话的想象力有人类以来便在本土民族中发挥作用，以及在本土民族被欧洲人发现时仍可见，这是错误的。这会是一个危险的误解。任何存在的本土民族都把它的神话创作归到一个更早的远古时代。

然而，尽管所有的民族都有神话和民间故事，但它们的数量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是不同的。直到最近，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相较于散文、小说等其他文学类型而言，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数量仍然非常庞大，而且对社群产生的意义也更为重要。

我们在此没有兴趣试图解释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而是想指出，如果真正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在哪里较少的话，非洲不是一个特例。

鉴于以上观点，我们必须着手研究那片广阔大陆的民间文学。

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并进入我们的主题——非洲本土民间文学的本质。非洲本土民间文学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它自成一体。在世界上同非洲差不多大小的其他地区没有这样的情况。相似点既体现在情节建构的类型、具体的主题，也延伸到了文学技巧。例如，歌曲在散文小说中的运用，道德规诫式的结尾和本源性的解释的普遍存在。

但比以上提及的相似点更显著和更基本的是强烈的现实主义、对人具有多种不同情绪的强调、对当代情境的注重，以及普遍存在于整个非洲口述文学中的高度的老练精明。人很少被描述成完完全全、不可分离地被固定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被迫扎根在大地上——与世界上广泛流传的观点相反，甚至在少数讨论所谓的高位神和天上的神灵的神话中，人们发现了一种几乎令人着迷的“地心说”。例如，神常常下到地上。在一些神话中，神曾经居住在地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迫上天。可以说：非洲的神在成为神之前，必须失去他们地上的“成分”或要素，以及他们和地上的联系。

这本故事集的前六个神话讨论了这个主题。最好的例子是来自西非多哥的克拉奇人的《神与人的分离》和来自这片陆地南端的布须曼人的《太阳和孩子们》^A。布须曼人拥有这样一个题材的神话，这表示它在非洲被广泛传播，因为不同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在克拉奇人的这个神话中，天神乌尔巴里被描绘为居住在大地上一——直接躺在大地母亲身上，因而可供他移动的空间非常小。在布须曼人的神话中，太阳躺在地上，孩子们则是神话中的英雄，被他们的母亲敦促去抬起太阳的腋窝。

现在，“天地之间的紧密融合是宇宙发展演变的初期”这一题材广为流传，古希腊人、古日本人、古阿芝特克人、波利尼西亚人都知道。在那些神话中，天神被刻画为住在高处的存在。在波利尼西亚的版本^B中，人要生存和良好地行使功能（因为他当时居住在黑暗中，在他的父母亲的怀抱里——希腊的版本同样如此），就必须“删除”他的神圣的父母亲，把他自己再推向苍穹一点，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最终到达自由。在相似的非洲神话中，这和乌尔巴里与大地的分离是迥然不同的。我们的多哥叙述者告诉我们，乌尔巴里上升到天空是因为他在人的手中遭受了许多侮辱。“尊严……厌恶地……上升到现在的位置，人只能敬仰他而无法接近他。”

我觉得没有什么别的神话跟这个神话类似。现实主义、地球中心主义和愤世嫉俗背后一定有一段悠久而独特的历史。

然而，愤世嫉俗并不总是普遍地伴随着非洲现实主义。后者讨论

A Bleek, W.H. l., Lloyd, L.C. Specimens of Bushmen Folklore. London: G. Allen & Company, Ltd, 1911.

B Radin, Paul.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927: 305.

的可能是更愉快的题材，如日常生活的快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忠诚、履行职责和因此得到的回报。劳特利奇在他的书《与一个史前的民族》(*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A中讲述了一个男人对他的姐姐的伟大的亲情。由于他的疏忽，他的姐姐被诱拐，于是他出门寻找她，忍受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终于找到了她。因为她不再居住在地上，他放弃了他的亲戚们和地上的欢乐，去陪伴她了。另有一个金图的故事则强调一个男人为了得到他心爱的女人需要经历种种考验。

但从总体来看，非洲神话中极少有浪漫主义，也没有感伤。它明显不是一种以如愿以偿为重要情节的文学，也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假设英雄会在最后获胜，或者错误总将被纠正的文学，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这里，我们又得要小心了，不要做出仓促或没有根据的假设和结论，尽管很遗憾，这些（尤其由文学史家得出的）假设和结论总是塑造着这个领域。即使是一个像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那样拥有令人吃惊的知识深度和广度的人都会被压垮。在他看来，只有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人拥有创作现实主义故事（中短篇小说）的能力，因为只有爱奥尼亚人学会了以恰当的人类表述来描绘人。^B他认为，他们从东方获得了这种知识，因为当我们谈到现实主义的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时，它确实是我们总是认为的东方的东西。

如果那样的评价是通过比较不同的伟大的历史文化得出的，那么就不奇怪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像历史的文化和非洲黑人的文化之间的差

A Routledge, W.S. *With a Prehistoric People: The Akikuyu of British East Africa*. London: E. Arnold, 1910.

B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U. *Die griechische Literatures Altertums//Wilamowitz-Moellendorff and Others. Die griechische und lateinische Literature und Sprache*. Berlin: B.G. Teubner, 1912: 56.

别那么大了。但是，最错误的就是把一个民族描述为比另一个民族更具有现实主义或更富于想象力。简而言之，黑人并不比其他任何种族更加现实或者更加不现实。

我们发现古希腊人、古日本人、波利尼西亚人和大多数美国的印第安部落人民的幻想和想象自由且不受约束，这并不是说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独特的情节和主题的有或无，以及对情节的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的处理，仅仅表示我们所探讨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趋向于排除一个和包含另一个。这些文学传统常常令人难以置信地充满活力。以爱斯基摩人为例，他们的动物故事极少。故事的主人公通常是一个人，题材也跟非洲的故事一样现实。然而，威斯康星和内布拉斯加的温尼贝戈人的文学传统就不一样了。我们发现他们区分神话和民间故事，以及中短篇小说时，一个双重的界限已清晰地形成，而且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第一个范畴里，我们讨论一个遥远的过去，它呈现的世界和行动者跟今天的那些截然不同。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英雄胜利，美德得到奖赏。相反，在中短篇小说中，我们讨论当代或者至少是历史的情境。故事中的人物总是人类，英雄们面对着人类存在的现实和变迁，结局往往是悲剧。但是，波利尼西亚人就不对故事作那样的区分，不规定任何一种结局。

我们也不应该在“什么构成幻想和想象”的概念上过于随意。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以来，在日耳曼国家（也包括英国和美国）中总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把这些概念定义得过于狭窄——主要用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的意象来思考它们。但这只是由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导致的一种偏狭主义。想象力的发挥和幻想多种多样，我们将看见这本故事集中的故事具有这个特点。所有的人类学家都认为，纳瓦霍神话有价值较高的意象，而如果论想象力，我想不出有什么会高于这本

书中的简短的叙事——我们有一只从一个屋子蹿到另一个屋子的老鼠般的人物形象，她观察着秘密的事，从一个衣橱钻到另一个衣橱，然后凭借经验创造出“故事孩子”，她给它穿上各种颜色的衣服，她收养了它，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这是一种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象征主义。它表现了大多数的本土民族社会中明显缺乏的一种文化成熟和老练精明，奇异地让人想起更复杂的东方文明。

许多社会理论家常常认为，神话和民间故事的题材是由一个民族的心理决定的，事实上并非如此。为一个部族或民族的心理寻求文化形态等价值代替物，是无法真正的促进神话和民间故事题材发展的。神话和民间故事的题材是由历史环境，较为固定和具体的文学传统和惯例提供的选择共同决定的。

此外，具有天赋的创作个体对这些传统和惯例的再阐释也影响着神话和民间故事题材的发展。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或部族的成员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并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感兴趣。

我们得记住以上这些，才能开始尝试解释以下问题：为什么非洲民间故事有它的独特性和特有的样态？为什么有的主题和母题存在，有的却缺席？为什么有的文体被接受，有的却不被接受？

二

非洲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沟通常常被拿来讨论。对于艾丽斯·维尔纳这样有能力的非洲学家而言，这个问题对研究非洲文化非常重要。她坚持“无论一个人是从地理学、民族学还是心理学方面研究非洲，